

● 中国历史

#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罗玉明, 温 波

(复旦大学 历史系, 上海 200433)

[作者简介] 罗玉明(1962-), 男, 湖南桃源人, 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副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温 波(1970-), 男, 江西九江人, 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摘 要]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积极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其中, 张学良的态度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第一因素。张学良不仅组织发动了西安事变, 而且首先提出了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 并采取有力措施促成其实现; 张学良被囚禁后, 又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 对西安事变善后循政治方式解决发挥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 张学良; 西安事变; 和平解决; 作用

[中图分类号] K26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1)04-0449-05

张学良是西安事变的策划者、组织者、指挥者, 又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首倡者、实施者。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姿态及其采取的有力措施, 是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的第一因素

—

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但对于扣蒋后如何处理蒋介石、如何解决西安事变, 起初张学良并没有作过多的考虑。然而,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张学良一开始就没有处死蒋介石的意思, 一开始就有有条件地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事变的思想

早在 12 月 11 日, 张学良部署扣蒋行动时, 就向参加扣蒋行动的将领强调: 要活捉蒋介石。他对孙铭九说: “你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 万不得已时, 只能把他的腿打伤, 不要叫他逃跑了。”<sup>[1]</sup>(第 217 页) 他吩咐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瓚, “千万注意不要伤害委员长”<sup>[1]</sup>(第 236 页)。这是他准备释蒋、和平解决事变思想的萌芽。

蒋介石失踪后, 张学良焦急万分, 他命令白凤翔: “如果九点找不到委员长, 就把你们的头送来!” 并对杨虎城说: “虎城兄, 如果委员长到西安后, 采纳了我们的意见, 我便送他回南京。”<sup>[1]</sup>(第 123 页) 12 月 13 日上午, 张学良会见被扣蒋方人员, 更明确地表示: “委员长今日诚然是中国的领袖, 即今后还是需要他做我们的领袖, 但领袖应虚心听取各方的意见, 和过去专制皇帝不同, 只要委员长能改变态度, 采纳意见, 我将亲自送他回南京。”<sup>[2]</sup>(第 202 页) 这可以说是张学良释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思想的确定。

但是, 扣蒋实现后, 情况变得十分复杂, 南京政府内的主战派出兵武力讨伐, 挑起内战, 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主张杀蒋的官兵不在少数, 中国共产党曾一度倾向审蒋; 西安各界群众更是跃跃欲试, 主张

公开审蒋,交付人民判决。为了避免内战,通过释蒋而达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张学良力排众议,果断地采取一系列措施,试图把西安事变引向和平解决的方向。

第一,致电南京政府诸要人和各地方实力派,阐明自己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和处理蒋介石的态度。12月12日,在对时局的宣言中就明确提出,发动西安事变是为了保证蒋介石的安全,“促其反省”<sup>[3]</sup>(第1055页)。宣言中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就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纲领,是释放蒋介石的前提条件。同日,他在致孔祥熙、宋美龄、冯玉祥、李烈均、程潜、宋哲元等人的电报中,一再表示:“请介公暂留西安,保证一切安全,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sup>[3]</sup>(第1056页)。张学良的和平态度,使南京政府中的主和派看到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希望,促使他们积极地为避免内战、和平解决事变而奔走。

第二,在西安各界群众和东北军官兵中反复阐明、宣传自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12月13日下午,张学良在对西北“剿匪”总部全体职员的训词中明确指出:“我们对蒋委员长绝对没有私仇私怨,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使他反省,正是爱护他。我们这种举动对蒋委员长是绝对无损的——如果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sup>[3]</sup>(第1067页)12月16日,张学良在西安市民大会上发表演说,表示:“我们是只求主张实现,此外我们既不要钱,也不要地盘。我们为了实现我们的主张,我们要立于抗日战线的第一线,我们要在抗日战线上效死。”他呼吁全国同胞“一致起来走向抗日战争,有力量出力量,有钱的出钱,尤其是武装同志,壮年同胞,一定要把一腔热血,洒在抗日战线上”<sup>[3]</sup>(第1080页)。这就使全国人民了解了事变的真相,消除了人们的误解,把舆论引导到反对内战、一致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上来。

第三,敞开和平大门,欢迎各界人士入陕斡旋,共商抗日大计。张学良在致南京政府诸要人和各地方实力派的电报中,邀请他们“或远赐教言,或躬亲来陕,开诚指示,共谋国事”<sup>[3]</sup>(第1059页)。希望冯玉祥“迅即命驾来陕,共决大计,力挽危舟”<sup>[3]</sup>(第1063页),宋美龄“如欲来陕,尤所欢迎”<sup>[3]</sup>(第1058页)。12月13日,端纳抵达洛阳后,张学良尤为高兴,立即复电端纳,欢迎来陕。端纳沟通西安与南京的消息后,和平之光已现。接着,张学良于12月16日致电顾祝同,请他与宋子文早日来陕,并表示绝对保证他们的安全。同时又致电中共,请派全权代表来西安共商大计。在张学良的邀请下,各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云集西安,在全国造成了一种和平解决事变的气氛,引导了整个局势的发展。

第四,以战卫和,揭露主战派企图挑起内战、破坏和局的阴谋。面对南京政府内部主战派的武力讨伐,为了避免内战的爆发和蔓延,张学良一方面调兵遣将,迎头痛击主战派的军事进攻,将战争限制在最小范围内,阻止内战的扩大,达到以战卫和的目的。另一方面发表演说和通电,痛斥主战派阴谋挑起内战的罪恶行径。12月14日,张学良发表广播演讲,坚决地表示:“我们这次举动,完全是为民请命,决非造成内乱。一切办法,决诸公论,只要合乎抗日救亡的主张,个人生命,在所不惜。若有不顾舆情,不纳忠言,一味肆行强力压迫者,即是全国之公敌。我们为保有国家民族一线生机打算,不能不誓死周旋,绝不屈服于暴力之下,即不幸而剩一兵一卒,亦必用在抗日疆场上。天日在上,绝无一字虚伪。”<sup>[3]</sup>(第1070页)12月18日,何应钦拟不执行蒋介石的停战手令,张学良立即致电何应钦,质问道:“弟部初未前进,而贵部已西入潼关,肆意轰炸,果谁动干戈耶?谁起内战耶?兄部如尽撤潼关以东,弟部自可停止移动。否则彼此军人,谁有不明此中关键也哉?”<sup>[3]</sup>(第1087页)一语道破了何应钦的险恶用心。12月19日,张学良致电蒋鼎文,希望蒋鼎文回南京后,“应不至因众口哶哶遂不尽言”,表示“抗日主张如不能实现,难送委座返京。南京同仁如能平一时之忿气,为整个事体打算,则一切一切,不难办到。否则,不顾大局,必欲用武力以对内,须知弟等发动此种惊人大事,岂能视同儿戏!一条生命,早已置诸度外。为自卫计,为保存抗日力量计,绝不惮起与周旋。谁造内乱,谁误国家,自有天下后世之公论也。弟部并未前进,而中央军已闯入潼关。是中央早已敌视此间,不惜国家与民命。中央既已不惜,弟等虽惜,亦复何用!国家安危,系于一念。请只转达南京党政诸公,共审虑之!如尚欲求解决,仍请子文、墨三西兄即来此间,极为欢迎,否则只好

各行其是,咎不在我矣”<sup>[3]</sup>(第 1096页)。12月 20日,张、杨发表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士书,指出:“我们的目的在对外,绝对不造成内战,并且极力避免内战,但是如果有违反民意的汉奸,用武力压迫我们,使我们不得贯彻主张,那我们为扫除误国误民的分子,争取民族的最后生存,当然我们要起而自卫,并且要粉碎这种恶势力。这不是我们造成内战,而是实行抗日救国的清道工作。”<sup>[3]</sup>(第 1102页)表达了自己反对内战,渴望和平,渴望全国一致团结抗日局面出现的强烈愿望。张学良对主战派内战阴谋的揭露和反内战的坚定立场,有效地避免了大规模内战的爆发,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积极作用。

第五,与蒋介石据理力争,耐心地、反复地劝说蒋介石接受八项政治主张。蒋介石接不接受张、杨的八项政治主张,改不改变对张、杨的敌视和合作态度,是决定西安事变能否和平解决的关键所在。蒋介石被扣后,张学良多次谒蒋,虽然屡受呵斥,仍不厌其烦地劝说蒋介石,希望蒋放弃过去的错误政策,改弦更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经过张学良反复劝说,再加上端纳和蒋百里等人的疏通,蒋介石终于转变了自己的态度,先是派蒋鼎文持停战手令去南京令何应钦执行,继之又委托宋氏兄妹出面谈判,这说明蒋介石已原则上同意了张、杨的八项政治主张,从而为迅速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铺平了道路。

第六,恭迎宋氏兄妹入陕,主持与二宋的和平谈判,底定和平大局。12月 20日,宋子文飞抵西安,张学良明确表示:东北军、十七路军已经决定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只要蒋介石答应双十二通电所要求的八项政治主张,三方面一致同意放蒋回南京。12月 22日,宋子文偕宋美龄再到西安,张学良亲到机场迎接,并应宋美龄的要求,不检查她的行李,这使宋美龄十分释然。从 12月 22日下午开始,西安方面以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为代表,与宋氏兄妹以张、杨的八项政治主张为基础,举行谈判。12月 24日,谈判结束,达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口头协议,底定了和平大局。

第七,力主尽快释放蒋介石,并亲自送蒋回南京,巩固西安事变的成果。张、杨与宋氏兄妹达成的口头协定,也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张学良以为大功告成,主张及时将蒋送回南京。但他的主张遭到了东北军、十七路军大部分将士的反对,甚至连杨虎城也不同意。在这种情况下,12月 25日,他找到杨虎城商议说:“现在不走不行了,夜长梦多,恐怕会出什么乱子,我决心,当天就送他走。”并表示要亲自送蒋回南京。杨虎城劝阻不住,只好同意了。当天下午,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南京。

由于张学良的努力,西安事变终于得到了和平解决,避免了一场新内战的爆发。

## 二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如何处理陕甘善后关系到能否巩固西安事变的成果。张学良虽身陷囹圄,但仍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对陕甘善后处理做多方努力,促成了陕甘善后沿政治解决的途径发展。

张学良送蒋回南京,起初估计最多三五天就可以返回西安,即使被军法审判后,他依然很乐观,认为有三位一体作后盾,蒋介石不得不放他回西安。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东北军内部出现了分化,蒋介石派出和谈使者来往于西安、南京之间,根本无意让张学良回去,特别是 1月 22日李志刚到南京,张学良从他那里得到有关情况后,张学良感到,他回不去了。他黯然地对李志刚说:“蒋是不会让我回去的,回去会增加他不喜欢的力量。请告诉虎城多容忍,要团结。我估计除非全面抗日,东北军还存在,可以利用我在东北军中发挥作用时,我才有可能出去,否则是不能出去的。”<sup>[1]</sup>(第 348页)

张学良虽身陷囹圄,却时刻关注着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的团结,关注着陕甘善后的处理。他希望贯彻和平宗旨,用政治方式处理陕甘善后。他利用自己的影响,不断致函杨虎城和东北军将领,劝他们以国家大事为重,不要把争取他回西安作为和谈条件;又上书蒋介石,提出妥善处理陕甘善后的建议。

1月 7日,蒋介石致函张学良,提出陕甘军事善后的两项办法:一是东北军应集中甘肃,其统帅人选由张学良推举;二是杨虎城酌留若干部队在西安,使其能行使绥靖职权,具体办法由杨虎城与顾祝同商定,并表示,此次陕甘善后的处理,全在政治而不用军事,要张学良劝告杨虎城及各将领“切实服从中央命令”<sup>[3]</sup>(第 1117页)。张学良收到蒋介石的信后,即于当日上书蒋介石,同意派人持他的亲笔信去西安。

并表达了对时局的担忧,所忧者“非只虑于陕甘,所虑者大局形势以及内乱延长,对外问题耳”。他认为要解决陕甘问题,“若以汤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则止矣”<sup>[3]</sup>(第 1115 页),并向蒋介石提出了“剿匪”与“匪不剿”两种方案,供蒋介石考虑。同时,张学良致函杨虎城和东北军将领,告知蒋介石已去奉化,蒋对国民党中央对张学良的处置也不满意,事情还有转寰的办法,但需要时间,他希望在此期间不要发生战争,勿兴乱国之机,“保东北仅有实力,而留为抗日之最先锋”,“一本我等救国救亡之苦心,有始有终,而对得起东北三千万父老,对得起国人也”<sup>[3]</sup>(第 1119 页)。

1月 7 日,东北元老莫德惠、刘哲来南京见张学良,张学良认为,何应钦是挑起内战的罪魁祸首,他请莫、刘去见何应钦劝阻其对陕用兵。1月 8 日,王化一、吴瀚涛来见张学良,张学良说:“中央扣留我,西安将领发出‘歌电’,何应钦调兵遣将,战事有一触即发之势。如果发生冲突,必使抗日力量因内战而受损失,和我们初衷完全相反,这是最令人痛心的事。”说罢失声痛哭。接着他又拿出两份遗嘱,一份是给他家庭的,一份是给东北军全体将领的,表示如果造成糜乱地方不可收拾的局面,他将自杀以谢天下。他要王、吴将他的意思转达给杨虎城和东北军全体将领。

张学良的信对杨虎城和东北军将士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杨虎城和东北军将士开会研究后,放弃了与南京对立的立场,一致赞同张学良的意见,避免内战,加强内部团结,并派代表去南京和谈,揭开了西安与南京谈判的序幕。1月 12 日,王、吴再度到南京将西安的决定告诉张学良时,张学良十分愉快,说:“我心平气和地尽我最大力量挽此危机,保存国家元气,准备抗日”,“不但东北军、十七路军应当同中央团结在一起,中央军和红军也必须团结在一起,全国抗日力量都须团结一致。只要全国一致抗日救亡,我个人生死安危,无足计较”。

为了巩固初步成果,张学良趁热打铁,一方面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在戴笠、米春霖的陪同下,于 1 月 13 日去奉化,以便及时与蒋介石商量有关事宜,一面于 1 月 13 日再函杨虎城和东北军将领。在给杨虎城的信中说:“为目前救此危局,勿为乱国计,商定办法二。请兄速下最大决心,使委座及弟易收束陕甘之局。关于改组政府及对日问题,准我等在三中全会提出,公开讨论。关于两案,盼兄等速即商讨,下最后果。如有意见补充,盼虎城派人来,更盼来一军长。如兄等认此二案之一案无问题,那是更好,盼即刻表示受命。委座告第十六日为限,盼诸兄为国家、为西北、为东北,请详计之,凡有利于国者,弟任何牺牲在所不惜,盼勿专为我个人谋计。西望云天,无任期盼好音。”<sup>[3]</sup>(第 1120 页)在致东北军将领的信中说:“委座之意,对东北军彼始终爱护,决不歧视。但在西北环境多所不便,如不遵从委座意旨,决难挽此劫运。弟一时不能离京,也不便离京,盼兄等有决心、有办法。委座讲,要自救才能救国。到此时,有大诚、有大勇,才能支此危局,才能真正抗日,才能回东北之一天。弟满腹热泪,一眼望东北,一眼望西北,而尤望兄等本我初衷,凡有利于国者,任何牺牲早已不计。盼诸兄计及国家利害,勿专为我个人谋也。临书不胜依依。”<sup>[3]</sup>(第 1121 页)。

从上面的信中明显地可以看出,张学良的心里充满了矛盾。一方面他的确希望西安与南京消除对立状态,避免内战,因而不惜对蒋妥协,在有利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条件下,和平解决陕甘善后。另一方面,他虽然反复强调不要以他回西安作为和平的先决条件,但在信中又表达出了早日回西安的强烈愿望,希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加强团结,为他早日回西安创造条件。这就紧紧地揪住着东北军将士特别是中下级军官的心。张学良的这种矛盾心理对西安方面产生了两种结果:一是表示服从南京政府,“恭领政府革职留任处分”,取消“双十二”时成立的一切临时组织,并派代表前往南京谈判,这就缓和了西安与南京的矛盾;二是使得西安方面又把争取张学良回西安作为接受南京谈判的先决条件,从而导致双方的谈判一度陷入僵局。1月 19 日,张学良致电杨虎城,催促杨虎城“能本上次瑞峰带去之甲项办法立即行之,以免夜长梦多,或至违反我等救国不祸国之初衷,盼我兄以大仁大勇之精神,躬为倡导,毅然施行”。至于他回西安的问题,“在陕局未解决前是不便谈起,断不可以为解决当前问题的焦点”<sup>[3]</sup>(第 1122 页)。张学良之所以一再催促杨虎城接受甲案,是因为它可以继续维护三位一体的团结,为他回西安创造条件。但西安方面并不明白这层含义,而是过分强调张学良回西安对维护三位一体团结的重要性,似乎

张学良不回来,三位一体就要瓦解,殊不料,蒋介石就是要拆散三位一体的团结,解除对自己的威胁。因而,西安方面越是强调张学良的重要性,蒋介石越是害怕,越是不肯放张回西安,以免放虎归山。西安方面不能审时度势,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为争取张学良回西安,内部分歧日益明显。

为坚定杨虎城和东北军将领接受甲案的决心,妥善解决陕甘善后,1月27日,张学良致电东北军将领,焦急地指出:“接受甲案并即实行,则良之出处此刻已不成问题。今因迁延,引起误会,委座已属为难万分。若今日再不接受,而仍以良之问题为先决条件,则爱我即以害我,不但害我,且害我团体,害我国家矣”。敦促他们“立命部队于今日正午以前开始移撤,勿再固执误事为要”<sup>[3]</sup>(第1123页)。至此,杨虎城和东北军只好遵令照办。从1月28日起,西安方面何柱国与顾祝同的参谋长赵启禄进入实质性的谈判,西安方面有条件地接受了甲案。消息传来,张学良十分高兴,于1月29日致电东北军将领:“倾闻大家皆能接受中央命令,甚为欣快。但又闻各师团长中多有以良之问题尚未能一致者。目下大局及国家问题重于良个人问题千百倍,诸兄对良之爱护,听闻之下,十分惭愧。但良有求于诸兄者,请恳切转告各师旅长暨各团营长与各级官兵:良与诸位共患难十余载,愚昧之处不知有几,但未尝敢计及个人利益,而将国家利益置于缓图,想为诸位同志所见及。夫良之国难亦兄等之国难,良之家仇虽不敢云为兄等之家仇,但兄等亦不能不分担若干。在今日情势之下,切盼兄等劝渝部下,本良救国勿祸国之初衷,万勿斤斤于良个人问题,致误大局。现陕事委座已交由顾主任全权处理,瑞凤、韵卿两兄亦已代表兄等前往接洽,务必遵照委座之意旨及前方所商之办法,迅速实施,勿再迁延为幸。”<sup>[3]</sup>(第1124页)

张学良本着救国、坚决避免内战、一致抗日的宗旨,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置个人生死于度外,表现出宽广的胸怀和爱国主义热忱,催人泪下,令人敬佩。

### 参 考 文 献

- [1] 吴福章.西安事变亲历记[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 [2] 秦孝仪.革命文献:第95辑[Z].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3.
- [3] 毕万文.张学良文集:第2辑[Z].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
- [4]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Z].北京:中华书局,1979.

(责任编辑 吴友法 涂文迁)

## ZHANG Xue-liang & Peaceful Settlement of Xi'an Incident

LUO Yu-ming, WEN Bo

(Department of Histor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Biographies** LUO Yu-ming(1962-),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Doctoral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history, Fud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China; WEN Bo(1970-), male, Doctoral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History, Fud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modern &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China.

**Abstract** The peaceful settlement of the Xi'an Incident was the result of all positive factors synthetic function. Among them, the first factor was Zhang Xueliang's attitude. This article explains that Zhang Xueliang was not only organized and launched the Xi'an Incident, but also adopted forceful measures to make it come true. After he was put in jail, he still brought into full play to resolve the aftermath of the Incident along with the political methods by using his position and effecting.

**Key words** ZHANG Xue-liang; the Xi'an Incident; peaceful settlement; function